



學林漫錄

五集

Z429/2:2

学 林 漫 录
五 集

中 华 书 局

1982 年 · 北京

封面题签

邹梦祥

封面设计

谈冰玉

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张忱石 傅璇琮 许逸民

学林漫录

五 集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77/。印张·183 千字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500 册

统一书号: 17018·114 定价: 0.90 元

目 录

回忆张菊生先生	江辛眉(1)
戊戌变法侧记	许姬传(8)
忆沈乙庵师	胡先骕遗作(24)
作者的知音	
——记徐调孚同志	摄 甫(27)
追忆调老	程毅中 傅璇琮 沈玉成(41)
《文学遗产》和陈翔鹤同志	劳 洪(46)
记目录学家孙耀卿	雷梦水(54)
读《曲园日记残稿》	邓云乡(62)
略谈陈寅恪先生的诗文证史	胡守为(69)
坚净居题跋	启 功(77)
罗音室读书笔记	吴世昌(87)
曲目丛拾	周绍良(96)
曲海一勺	陆萼庭(103)
京剧老生流派综说	吴小如(109)
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	黄永年(120)
李冰和他的治水之法	傅振伦(129)
桑椹与民食	陈仲安(138)
释“句吴”	魏嵩山(141)

《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考	王瑞来(147)
诗词赘语	周本淳(156)
李贺诗歌的色彩美	钟元凯(163)
《唐诗三百首新注》补释	金性尧(172)
唐诗地名小考	刘 满(178)
《马氏文通》的实际作者是马相伯吗	郭国义(186)

古籍丛谭

《元丰九域志》成书源流考	魏嵩山 王文楚(190)
两种《三才图会》	陈文良 李鼎霞(195)

书 评

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李裕民(200)
清代官修的外交档案资料汇编	
——《筹办夷务始末》	何双生 刘德麟(207)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读《离骚纂义》	许德楠(217)
-----------------	----------

文史哲研究工作者介绍

杨伯峻(220)程千帆(221)胡念贻(222)陈仲安(222)

刘世德(223)

古籍与学术著作书目(1981.1—6)	(224)
---------------------------	-------

回忆张菊生先生

江辛眉

一九四四年农历新年以前，我接到先师郑乡先生从乡下来信，中附《甲申重游泮水》诗一首，信上丁宁再三，要我把这首诗及另附一函送到霞飞路善钟路沙法花园张菊生先生家里。张菊老与先师是清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入泮的同学，这一年同时入泮的还有先君韵士公和平湖葛稚威先生等人。张菊老名元济，浙江海盐人。有趣的是这一年入泮同案中竟有两个人同名同姓，都叫张元济。我记得小时候在乡下老屋的书斋里挂着一帧甲申同案的合影，其中两位张元济先生，一长一短，同在一起，这是家乡耆旧的轶闻佳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家与海盐张氏，本有通家之谊。但自从先君作古以后，家里曾遭到连续十一天的穿窬盗警，不得已潜名隐姓避居嘉兴姊氏家中。因此父辈故交，几乎都中断了往来。

一九三七年，日寇南侵，自金山卫登陆。淞沪沦陷，禾城不守。举家避难至上海租界，不久我考入无锡国专攻读，从娄东唐蔚芝先生游，始知张菊老在戊戌变法中受到株连，革职永不叙用。旋出京来沪，弃政从商，创办商务印书馆，为传播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此又激发我对他的仰慕，却始终没有机会去拜访他。自从郑乡先生来信以后，我才下定决心以贺年兼送信的名义去拜会这位从未见过面的父执。

那一天是农历年初二上午，我穿了一身崭新的西服和大衣，按

址找到菊老的住所。有一位老保姆应门，她问明来由，领我进入客堂。然后上去通报。我环顾这里是一栋双开间的小洋房，客堂与旁边的一间起居室相通连，陈设极为简单，说明屋主持家俭嗇，与大名鼎鼎的实业家的身分颇不相侔。再看自己身上那副纨绔子弟式的打扮，不觉脸上发烧而局促不安起来。隔不多久，一位态度安闲，面目慈祥的老人，走进屋来。他先向我上下打量一下，然后双手微微一拱，我下意识地疾趋而前，行了一个大礼。这时他突然把身子一侧，用右手向外一摆，接着俯身把我扶起。我看他这一连串的动作，既认真又利索，真是前清官场前辈的风范。这时我才把郑乡先生的信件和诗双手递上，他一边招呼我入坐，一边看完信后又转身走出去，一会儿他手中拿了一本薄薄的书走到我跟前，翻开一看，是一本木刻的《甲申入洋同案题名录》，其中有一页上刻着先君江廷诤的名字。他指着这一页，亲切地问起我的家庭近况。当我说到先君已经弃养多年惟有母亲在堂时，只见他慨然改容，跌足长叹道：“二十几年前，寄园一会，料不到他遽作古人，甲申同学已寥寥无几了。”言下不胜歎歎。一种亲切、真挚的感情，照拂心头，使我大受感动而潸然出涕。这个印象，真是毕生难忘。

这次见面，还有一件事，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即对我攻读古书，并不十分赞成。我自小由于家庭的影响，对古书发生兴趣，进无锡国专以前，常到交大去听唐蔚芝先生的读文法。进国专以后，沾沾自喜，颇以为得所。所以菊老问我在何处读书，我便把经历一一回对，满以为一定会得到这位老前辈的称赞。不料恰恰并非如此。我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我讲完以后，菊老半晌不语，然后慢吞吞地说：“世兄究心国故，抱残守缺，确乎难得。不过少年有为，最好能兼学点西文，多多开拓眼界……”又说张香涛首鼠两端，不无可议，然而留心西学，奖励通译，自有过人之处。同时还讲到商务印书馆多编译西书，其目的在于扩大国人眼界，交流文化，以图振兴中华。

更谈起他通艺学堂的学生，后来有些人在商务也发挥了作用等等。这一番话，分明对我学业上的因循守旧，有所规劝。想不到将近八十的老人，头脑比年轻人还新，相形之下，我感到万分惭愧。后来知道我在校的专业是史学，才显露出高兴的样子，立即检出两册线装书送给我，那就是他所著的《校史随笔》。

说实话，我当时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而已。对于史学之经纬，古书之疑义，仅仅是一知半解；有些甚至是一窍不通。菊老见赠的《随笔》，都是有关古史校读中的精辟见解，披览一过，不甚了了。所以我第二次上他家时，他提起这本书中的一些问题，我竟满脸通红，瞠目不知所对。但是他老人家却耐心地给我讲解校书的要领。说古书之校勘，乃探求其本来面目，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求史实之真。古书流传久远，有因字迹漫漶而造成谬讹，不可避免地给后人读书时带来了困难。如“乙酉”之“乙”字与“己”字形近而搞错，在时间上可以出现二十四年到三十六年的差错。当然也有刻本上的问题，传钞上的问题，甚至是校勘本身的错误，原因并不单纯，而麻烦则来自多方。所以研究古代史乘，校勘学是基本功之一。例如《辽史》中屡有诸帝在鸭绿江、混同江等地“钓鱼”的记载，“钓鱼”二字，凡二十二见。殊不知“钓”字本来是个“钩”字。只因刻书时校者不了解北方民族绳钩捕鱼的方式和“畋渔”的习俗，误以“钩”字为“钓”字之讹而误改，以致闹了笑话。试想长江大河，激流汤汤，岂是投竿垂钓之所在？但是《辽史》的许多刻本，如殿本、南监本等全作“钓”字，惟元刊本则作“钩”字。但是读者往往不加注意，遂是“钓”而非“钩”。清厉鹗《辽史拾遗》引程大昌《演繁露》辨之甚审，其中有一段话说：

达鲁河钩牛鱼，虏中盛礼，意慕中国赏花钓鱼，然非钓也，钩也。

又详细地描述钓鱼的情况说：

其钩是鱼也，房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纵逸，又从而驱之，使集房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斲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

从“钩鱼”误作“钓鱼”一例，可知从事校勘者，若非博瞻精熟，是难以胜任的。我对于校勘这一门学问，向无所知。经过菊老深入浅出教导，才感到学问之道，真是横无际涯的海洋，由此，激发了我无穷的兴趣。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对我讲《南齐书》中的一个形讹的校例。他说《南齐书》纪一载刘秉的弟弟刘遐与嫡母殷氏的养女私通，不久殷氏暴卒，人家都怀疑是被谋害致死的。毛氏汲古阁本及三朝本是这样写的：

殷言口中血出，众疑行毒害。

“言口中血出”一句，“言”字是不可解的。因此明监本改成“舌”字。“舌口中血出”一句也有问题，盖仅仅舌中血出，未必致命，何致众疑行毒害？于理也说不通。可知“言”字与“舌”字都存在问题。宋治平二年开雕的《南齐书》则为：

殷亡口中血出，众疑行毒害。

其中“亡”“口”二字略小，墨印溢出，不了解的人把二字看成一字，变成“言”字。因“言”字不可识而改成“言”字；又因“言”字不可通而改成“舌”字，辗转缠误，愈离愈远，才闹了这样的笑话。证之《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说：

义宗子遐，字道彦，与嫡母殷养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卒，未大殓，口鼻流血。

情节完全符合，于是一切疑义都涣然冰释。所以不懂得校勘中的多种形讹而误校，反引读者入于迷途而不返。这一段校例的

解释，对我来说，无异是一枚开启心灵智牖的钥匙，后来我读到高邮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战国策·秦策》“今者”条载：“范雎至秦，王庭迎，谓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今者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既云今义渠之事已，则义渠之事急，为追叙过去之词，何得冠以‘今者’二字？《史记·范雎传》作‘会义渠之事急’是也。盖义渠事急，故不得以身受命也。‘今者’二字，形合而似‘会’，盖一字而离为二字之讹也。”颇感他们校勘的思路是相一致的。真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也。”从此我开始注意到古书中的各种校例，凡惬意心者，随手记下，经过一段时间，便向他求教。他看我很勤奋，非常高兴，特地关嘱我把校例分成若干类别，从讹、倒、衍、夺中再细分各种致讹的原委。我记得当时是抄在一本黑色的硬面抄本上的，他亲自替我在扉页上写上《校例类腋》四个毛笔字，但没有署名，有如塾师替蒙童开作业簿簿面的样子，一种亲切而慈祥的情景，使我永铭心版。这本厚厚的簿子上我钞上不少校例，累积至八万多字，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人莫名其妙地抄走了。在这一场“史无前例”中，大量国家的珍贵文物都被疯狂地毁灭了！这钞本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菊老他老人家仅仅留给我这四个字的手泽，竟也逃不过那些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的魔掌，清夜梦回，爽然若失，心底老是隐隐作痛。

张菊老的为人，谦虚诚恳，蔼然可亲。奖掖后进，不遗余力。过去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商务印书馆旧时同仁写的回忆文章，莫不众口交誉。这一层在我的亲身经历中完全可以证明其真实性。我与他年龄相差五十多岁，但是他总是象对待子侄那样的来对待我，从来没有疾言厉色。而是彬彬有礼，毫无一点架子。我每次告辞回家，往往送我到门口。亲切地道别，并说：“向太夫人请安。”老辈形象，真是光风霁月。同时在他那慈祥亲切的神情中还带着一

种严峻的督责意味，使人感受更深。我第二次上他家时，特地抄录几首诗去求教。一首是和郑乡先生的《重游泮水》诗，开头有“题名载检黻宫案，泮水芹香六十年”两句（全诗已记忆不起）。我看他戴着黑边圆框的眼镜，注意力很集中反复地吟哦起来，读罢，只说诗中用《鲁颂·泮水》中的字面太多，而且重复了两个“年”字。其他几首是和一位范姓老同学的《落花》诗，他看了并不满意，却说：“宋艳班香，很有功力。青年人难免要写些落花残雪之作，不过还是做点真学问要紧。”所谓“真学问”，照我的理解就是扎扎实实地读点书。但回顾近二十多年来，颠沛流离，学殖荒落，过去读的史学专业，几乎抛得一千二净；反而一头扎进旧体诗词中自我陶醉，完全背离了菊老的教导和期望。至今思之，噬脐何及！

我受教于菊老，为时十分短暂，自从一九四六年以后，因授课繁忙，迫于绳削学生的作业，难得去沙法花园。其间他曾送给我许多书籍，记得有一次去拜访他，只见客堂里八仙桌上放着一大捆书，当时我并不在意。到辞别时，他先关照那老保姆去雇人力车，对我说明这捆书是赠送给我的。说明他处理事务，总是那么有条有理。我回家打开一看，中有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集》、《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崔适的《史记探源》等书，大大的开拓我读书的眼界。我在《校例类腋》中所札录的，基本上都是从这些书中抄录的。但现在都已荡然无存了。最近我在上海师院讲授“校雠学”选修课，因为要编写讲义，不得不从各方面重新设法借到这些书籍。在编写校例时，开卷如对故人，不禁感慨系之。同时又勾起我对张菊老深切的缅怀。他晚年得了癱闭之症，曾写了好几首诗，用铅字排印，分寄亲友，我也收到一份，记得中有“散原海日两相仍”之句，就是说陈三立和沈子培两位老先生，到晚年都得这种毛病。他对疾病之来，抱着很旷达的态度。解放以后，他拥护

党和社会主义，表示从戊戌政变以来，对国家民族的希望，有如雾中扬帆，既看不到前途，又处处有触礁的危险。辛亥以后，仍然如此，想不到到了晚年才看到一线光明，所以心境十分愉悦。傅增湘先生曾经称道他“坚毅劬苦，迥越恒人”。这仅仅是指他治学态度的一个方面，而他的创业精神和爱国思想，却无一不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菊老是我学业上的领路人，他的为人，永远是我仰望的山斗。如今一星半点地写下一些回忆，主要是希望广大青年读者从中得到启迪，搞好学风，勤奋读书，以振兴中华，我想这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纪念。

一九八一年五月于上海师院

戊戌变法侧记

许 姬 传

我八岁时(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公元1907),先母徐太君玉辉(仁镒)把我送到杭州从外祖父徐仅叟先生读书(名致靖字子静,戊戌政变时,被判绞监候,庚子年出狱后,别号仅叟,意谓六君子被害,刀下仅存的意思,以下简称仅老)。课余还教唱昆曲,下围棋、象棋。由于仅老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从他口中听到不少可歌可泣的遗闻轶事。二十岁后,曾拟通过徐氏一家遭遇,从侧面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某些环节,但我觉得写作经验不够,同时,有些事情真相没有弄清楚,迟迟未能下笔。1949年,我随梅兰芳先生旅居北京。三十年来,陆续搜访戊戌变法有关徐氏的事迹,几度沧桑,亲故凋零,因此,亲友中比我年长的口述资料是极为可贵的。

我的堂舅徐凌霄、徐一士、徐勉甫、表兄言简斋、言申夫(他们是大舅父徐研甫的女婿)以及我与源来弟打算写一篇“徐仅叟先生传略”。曾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公园的双虹榭开过几次座谈会,由简斋兄执笔纪录,其中一士舅提供的资料最多。当时,指定由我起草,文革的风暴,搁置了十几年,在源来弟被抄退回的遗物中,发现原始纪录,如今,只我与申夫尚在人间,可以商榷的也只有我们二人了。今据言简斋的纪录稿,包括一士舅的补充函件与翦伯赞、张次溪等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互相参核考订,写成此文。我是徐家培养起来的,写此文的目的,除了实现大家的愿望,还含有纪念的性质,衰老余年,定多舛谬,尚希读者教之。本文所纪年月戊戌时以旧历为主,因口述时,均系旧历干支

也。辛亥后，改用公元纪年。

徐致靖折保康、梁、谭等经过

戊戌变法时，外祖父徐致靖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大舅父徐仁铸（字研甫，以下简称研舅）是湖南学政；二舅父徐仁镜（字莹甫，以下简称莹舅）是翰林院编修；堂舅徐仁录（字艺甫，是康有为的学生，以下简称艺舅）是举人。以上四位与戊戌变法有直接关系的人物，本文以他们为主线来叙述。

仅老的性格，刚正不阿，淡于名利，喜唱昆曲，与任道熔（筱沅）共同研究纳书楹叶堂一派，颇得精髓。还精通宫谱，能作曲，对笛子、鼓板、三弦以及皮黄的胡琴都能演奏。皮黄老生宗程长庚，小生学徐小香。仅老曾教我程长庚的《天水关》、徐小香的《群英会》，他说：“唱皮黄讲究沈着简练，切合剧中人身份，花腔取巧，不足为训。”

己未（1895）年丁忧扶柩回到宜兴（当时的制度，父母死后，要解职服孝，二十七个月后称为服满，复职）。当时，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胞叔徐憩泉是个秀才，没有做官，但有见识，仅老很契重他。他看到侄儿有消极态度，就说，你现在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仅老受到他的鼓励，丁酉年服满，就积极投入维新变法。

当甲午之战败于日本，赔款割地，列强胁割，虎视眈眈，朝野有志之士，主张变法维新，而光绪帝在甲午后，励精图治，仅老上了“请明定国是疏”这个奏折的精神是：“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独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用今天的语汇就是要皇帝表态。戊戌四月，光绪颁布定国是诏。仅老又上“保荐

人才折”保举了五个人，一、工部主事康祖诒(有为)，二、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公度)，三、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复生)，四、刑部主事张元济(菊生)，五、广东举人梁启超(任公)。

梁启超是谭嗣同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右铭)、学使徐仁铸推荐，而被聘为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的。研舅曾把梁启超所著《轺轩今语》颁示学宫。长沙进士叶德辉是研舅的门生，和老师唱反调，作《今语评》。同时王先谦等反对研舅的革新主张。在湖南地方势力守旧派的掣肘下，推行新政遇到阻力，于是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研舅将谭、梁、黄等简历寄给仅老，这就是保举人才折的经过。他们的官阶、思想、遭遇就我所知，简略地谈一谈。

梁启超被荐入京后，光绪召见一次，按清代习惯，举人召见后，有赐翰林或内阁中书的例子。当时梁的名气已很大，有时口头康梁并称，但召见后，只赏六品顶戴，据莹舅说：“任公广东乡音很重，光绪听不清他的话，又怕慈禧的爪牙窃听，不便反复询问，故不得重用。”

谭嗣同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招，回家乡办新政。如内河小轮、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保卫局、南学会等，都是他倡议策划的。他与研舅最为投契，我幼年在杭州徐家读书时，曾看到研舅遗物中，有六本粘贴信札的簿子，内中有黄遵宪、熊希龄、陈三立、郑孝胥等人的来信，谭嗣同的信有十几通，内容大半谈新政，也有学术商讨，可惜多次动乱迁徙，这些珍贵文献，全部散失了。

黄遵宪曾任驻日使馆参赞，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以仅老保荐，内调三品卿，出使日本，未到任而慈禧再垂帘，光绪被软禁瀛台，他在上海被捕。因日方抗议，被迫于二日后释放，黄遵宪从此隐居著书。他是最早研究日本历史的，著作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1952年，他的侄儿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黄伯权到

北京探望梅兰芳先生，送了我一本《人境庐诗草》，他对我说：“这本书是在新加坡翻印的，上面的签条是徐研甫学使的手迹。”

我看到诗草中有“己亥怀人诗”，共十四首，从第一首蒙宁陈右铭（宝箴）到善化皮鹿门（锡瑞），其中第二首是“宛平徐子静（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疏惊人泣鬼神。寻遍东林南北部，一家钩党古无人。”

第十一首“宛平徐研父（仁铸）”：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白头元鬓哀蝉曲，减尽维摩旧带围。”

姬传按，徐家原籍宜兴，因考试下北闱，入宛平籍。以后，我的堂妹许蕨南给我看先叔松如先生手批朱孝臧（古微）的《疆村词》，内有一阙《烛影摇红》，题目是“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内容暗切戊戌变法事：

“春暝钩帘，柳条西北轻云蔽，博劳千啖不成晴，烟约游丝坠，狼藉繁樱划地。傍楼阴东风又起，千红沈损，鹌鹑声中，残阳谁系。容易消凝，楚兰多少伤心事，等闲寻到酒边来，滴滴沧洲泪。袖手危栏独倚，翠蓬翻，冥冥海气，鱼龙风恶，半折芳馨，愁心难寄。”

松如四叔认为这是一首“词史”他作了眉批：“前阙皆言戊戌政变，所谓话旧也；春暝二句，孝钦再垂帘也；博劳二句，新党事败也；狼藉句，六君子被祸也；傍楼阴四句，旧党炳政，新政全翻而国事不堪问也；鹌鹑用欧阳永叔诗意，指宫廷言。下阙，楚兰句指湘抚陈右铭，翠蓬数语为外交惜人才。”

二十年代，我在诗人陈曾寿（仁先）苍虬阁中，见到朱古微，他谈起慈禧虐待光绪，屠杀维新志士，愤愤不平。他还是一位风趣的老人，那天有人请他写字，我问他：“古老，您的字有些左倾。”他笑

答：“如果右倾，就是衙门里书办抄公文的字了。”与朱古微齐名的况周颐（蕙笙），著有《蕙风词》，他非常倾倒人境庐话旧之作，视为畏友。

藏南妹受四叔父松如先生庭训，能诗，读此后，成诗一律，附录于此：

“励精图治竟沉迷，忠正敢当百尺梯。子母纷争颁国是，君臣际会振丹圭。瀛台滞蹕千秋迹，婴杵同担生死携。烛影摇红融史笔，画龙点睛仰眉批。”

张元济在《戊戌政变的回忆》中说，由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他与康有为，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在朝房里碰见荣禄，康有为大谈新政，荣禄唯唯诺诺，光绪召见康先生，谈了一刻钟出来，他进去在勤政殿旁一间小屋见光绪，光绪谈到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纠纷，以及开办铁路。张答必须赶紧培养人才，如办铁路。不能完全倚赖外国工程师。当问到张菊生在北京所办通艺学堂时，学生人数，功课项目等，问得很仔细。据张说：光绪说话时语气极温和，但声音很低，御座后窗外似有人影，谈话约三刻钟。张元济戊戌八月罢官后，到上海办商务印书馆，莹舅被延聘编撰中学教科书。民国初年张菊生由沪来杭探望仅老。以后，表兄徐衍高（肖研，乃研舅之子）曾以研舅遗著《涵斋诗稿》请张菊生用仿宋字排印，分送戚友，1949年，我随梅兰芳先生到北京开文代会，在旧六国饭店见到张先生，问起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事，他说：“我在戊戌政变中是外围，有些事没有参加。”

康有为与保国会

戊戌四月，康有为在京发起成立保国会，李盛铎（木斋）参预其事，曾对仅老称道康的才识，后与康不睦而分裂。康有为起草的保国会章程共三十条，是变法维新的纲领，现摘录第一第二条：